



陶飞亚 主编

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

(1922-1927)

张元隆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陶飞亚 主编

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

(1922-1927)

张元隆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1922~1927/张元隆著. —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 3
(转型期的近代中国社会丛书/陶飞亚主编)
ISBN 978-7-81118-739-7

I. ①上… II. ①张… III. ①上海大学—校史—
1922~1927②上海大学—校友—生平事迹 IV.
①G649.285.②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3709 号

责任编辑 郭纯生 李旭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技术编辑 金鑫 章斐

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1922—1927)

张元隆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7.5 字数 277 千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100

ISBN 978-7-81118-739-7/G·577 定价：54.00 元

前言 Foreword

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曾经由国共合作创办过一所“貌不惊人”的大学，名曰上海大学（1922—1927）。这所学校虽然没有巍峨的校舍、完善的设备和充足的经费，只存在了不到 5 年的时间，被戏称为“弄堂大学”；但是，她却以超乎寻常的魅力，凝聚了一大批名师贤达同舟共济开拓前行，吸引了数千为追求社会进步而发奋学习的青年学子，造就了一大批职业革命者和杰出的专业人才，在中国现代的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独树一帜，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有人把她赞誉为“文有上大，武有黄埔”；有人把她概括为“北大酝酿五四精神，上大成就五卅精神”；而当时的办学则努力实践，希望把上大办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作为一所大学，自有其与其他大学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独到的个性。就共性来说，大学教育在本质上是培养具有现代知识技术和现代国民性格的现代文明人。就其个性来说，20 年代的上海大学，存世于风雷激荡的国民革命时期，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上大汇集着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更注重造就推进国民革命的人才，更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更注重对社会变革的直接参与。这就使得这所学校或被称之为“红色学府”，或被称之为“革命的熔炉”，或被称之为“社会的学校”……由此引起研究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学者的关注，而对其教育风范则相对被湮没，较少深入地挖掘和探究。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30 年代的名言，近年每每为人追念和思量。一所学校有大楼固然好，但学校的声望更与学校中具有真才实学的教育家紧密相连。如蔡元培、蒋梦麟之于

北京大学，梅贻琦、潘光旦之于清华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罗家伦、吴有训之于中央大学，马相伯、李登辉之于复旦大学，唐文治之于交通大学，这些大师级名人奠定了他们所执掌的学校的教育风范，并成为这些大学的人格化象征。

教师是大学的台柱，特别是大师、名人，使学校熠熠生辉。20年代的上海大学名师荟萃，于右任、邓中夏、瞿秋白、邵力子、陈望道、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施存统、恽代英、任弼时、茅盾、俞平伯、蒋光慈、田汉、刘大白、萧楚女、杨贤江等等，或执掌校务，或执鞭教坛，或慨然讲学。他们热心教育事业，富有献身精神；勇于探索开拓，富有创新意识；道德品质高尚，富有人格魅力。他们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演绎着教育与革命双重变奏的乐章。

培养学生是大学的主要目的，而学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特别是学生成名成家，成为举世英豪，则又给学校增添光彩。从这个意义上说，20年代的上海大学可谓英才济济，秦邦宪、王稼祥、杨尚昆、李硕勋、刘华、何秉彝、阳翰笙、施蛰存、丁玲、戴望舒、孔另境、匡亚明、杨之华、张琴秋、钟复光、王一知等等，从祖国各地辗转来沪，就学上大。他们充满朝气，求知若渴，勤奋好学，在老师的悉心培育和指导下，探求真理，积极思考，追求卓越，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洪流，后来或成为职业革命家，或成为学有专精的理论家和文学家。

上大师生“向以改造社会为职志，对于社会事业尤具勇猛进取的精神”。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留下的足迹和回响，可歌可泣，耐人寻味。

本书从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的关系着眼，所阐述的人物，以在上海大学的活动史迹为重点，着重揭示名人与上大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由此折射上大在教育、学术、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成就，从一个侧面展示20年代上海大学的发展风貌，以及对中国社会乃至革命事业所作的历史贡献。

本书分为领导成员、名师荟萃、英才济济、来龙去脉、各地师生、革命伴侣等六章。前三章分别对领导层、教师、学生中的重要人物加以探究。第四章以具有一些共同经历人物的合组形式，阐述几组上大师生从何而来，归趋何往。第五章对一些史料零散或不详的人物，按不同省籍的方式予以简述；对各地师生的孙中山情结作了梳理和寻觅。第六章选择上大师生中的四对革命伴侣，以反映他们的恋爱、婚姻及与事业的关联。还有些人物虽然非常著

名,本应纳入其中,但限于史料匮乏等原因,暂付阙如。书后附录“茅盾回忆上海大学”、“阳翰笙回忆上海大学”、“上海大学教坛撷趣”、“上海大学大事记”。

上海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的地位,与目前对上大的研究状况并不十分相称,有关名人在上大的记载尤显不足。笔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对此逐步留意、搜集、梳理、钩沉,对相关人物的文集、年谱、传记和当事人的回忆录,尽可能加以翻检,对一些有歧义的记载作了相应的考订,有关人物的部分篇章,应上海大学校报约请,从2007年起以简短文字在副刊“校史钩沉”栏目发表,得到了一些评正。尽管笔者勉力而为,但由于主、客观的条件所限,不能尽如人意。有疏漏讹误之处,诚恳欢迎读者指教。

目录 Contents

前言 / 1

第一章 领导成员 / 1

- 一、于右任执掌上海大学 / 1
- 二、邓中夏主持上大校务 / 9
- 三、瞿秋白推进上大发展 / 16
- 四、邵力子辅佐管理上大 / 27
- 五、陈望道与上大的起落 / 33

第二章 名师荟萃 / 41

- 一、李大钊到上海大学作讲演 / 41
- 二、蔡和森讲授“社会进化史” / 47
- 三、张太雷任教于上海大学 / 53
- 四、茅盾在上海大学兼教职 / 59
- 五、施存统在上海大学的活动 / 65
- 六、古典文学硕儒俞平伯 / 70

第三章 英才济济 / 76

- 一、学运领袖李硕勋 / 76
- 二、工运领袖刘华 / 84
- 三、献身“五卅”的何秉彝 / 92
- 四、“熔炉”中练就杨之华 / 97
- 五、阳翰笙自觉革命的起点 / 103

六、施蛰存深谙“上大精神” / 108

七、戴望舒就读上大中文系 / 113

八、孔另境置身上大“洪炉” / 117

第四章 来龙去脉 / 122

一、任弼时、蒋光慈、郑超麟：从东方大学到上海大学 / 122

二、王一知、王剑虹、丁玲：从平民女校到上海大学 / 133

三、邵力子、恽代英、张治中：从上海大学到黄埔军校 / 143

四、王稼祥、秦邦宪、杨尚昆：从上海大学到中山大学 / 155

第五章 各地师生 / 167

一、“商务”来上大兼职的教员 / 167

二、上海大学的江苏籍师生 / 171

三、上海大学的浙江籍师生 / 178

四、上海大学的四川籍师生 / 184

五、上海大学的湖南籍师生 / 190

六、上海大学的安徽籍师生 / 194

七、上海大学的陕西籍师生 / 198

八、上大师生的孙中山情结 / 202

第六章 革命伴侣 / 209

一、秋之白华 / 209

二、桃李相依 / 213

三、复光复亮 / 217

四、珠联璧合 / 220

附录 / 225

附录一 茅盾回忆上海大学 / 225

附录二 阳翰笙回忆上海大学 / 230

附录三 上海大学教坛撷趣 / 248

附录四 上海大学大事记 / 254

后记 / 270

第一章 领导成员

20世纪20年代国共合作兴办的上海大学,能赢得“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美誉,与上大有着一支阵容强大的管理团队密不可分。于右任出任上大校长,提高了学校的社会声望;邓中夏受聘总务长,实际主持上大校务,使学校充满生机和活力;瞿秋白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规划学校发展,为把上大建成“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呕心沥血;邵力子副校长协助校长管理上大,参与学校的创办和建设不辞辛劳;陈望道作为上大后期的实际领导人,为维持学校生存和发展殚精竭虑。他们既是学校的领导成员,又大多依然活跃在教学的第一线,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充满热情地传道授业,关爱备至地教书育人。他们虽然党派政见有所不同,个人经历各有差异,但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贤达之士,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为“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同舟共济,从而谱写了上大在中国现代教育史和革命史上的绚丽篇章。

于右任执掌上海大学

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成立,于右任(1879—1964)出任上大校长。这样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士,执掌上海大学,其中有着一段令人回味的故事。

于右任出身寒门,励志向学,崭露头角。早年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为民请命,倡言革命;中年投笔从戎,在陕西组织靖国军,统兵展开护法运动;晚年在台湾以生命的最后张力,发出“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思乡之念。厥为共和元勋,监察之父。孙中山延之为友,蒋介石敬之若师。

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1922—1927） | ①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校址在闸北青岛路（后改称青云路）青云里。当时，由于学校设在青云里的弄堂里，校舍仅仅是石库门2层楼房的10余房间，教学设备也极其简陋，遂被人们称之为“弄堂大学”。1922年春，时任校长的王理堂，为了盈利的目的，打着“提倡新文化”的旗号，罗列了几个名人，竖起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校牌，就匆匆地开学了。而王理堂竟然将学生预缴的学膳费中饱私囊，自己跑到日本去留学镀金。当时入学的青年许多经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不能忍受学店老板的愚弄，遂引发学潮，强烈要求校方进行改组。在酝酿校务改组过程中，学生们提出，拟邀请陈独秀、章太炎、于右任三人中之一位出任校长。但陈独秀行踪不定，政治色彩太浓；章太炎隐居苏州，闭门不出；而于右任正好此时又来到上海，在《民国日报》撰文提出“欲建设新民国，当先建设新教育”的主张。因此在这三人中，于右任成为最合适的人选。学生代表设法找到了当时具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请求邵力子邀约于右任担任校长。邵力子与于右任是知交，尤其在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后，邵力子继任《民立报》主笔，跟于右任关系甚密，讨伐袁世凯的檄文和短论，大都出自二人之手。当邵力子转达学生愿望，请求于右任出任东南高师校长时，于右任犹豫再三，他深知如果接手，自己面对的将是一个烂摊子，感到非常棘手。但在邵力子的帮助和国民党内的柏文蔚、柳亚子、杨杏佛、叶楚伦等极力促驾下，于右任为学生代表的殷切恳求所动，最终还是同意出任校长，并建议将校名改为上海大学，同时决定由邵力子担任副校长，共同担负起改组学校、发展教育的责任。

1922年10月23日，是上海大学成立的喜庆日子。《民国日报》发表《上海大学启事》：“本校原名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因东南两字与国立东南大学相同，兹从改组会议议决变更学制，定名上海大学，公举于右任先生为本大学校长。”^①这天上午，全体学生150余人手执欢迎小旗，并组织了军乐队，到北火车站列队迎候新校长。当于右任、邵力子乘坐临时雇用的汽车经过欢迎队伍时，音乐声和欢呼声汇成一团。接着由乐队开道，学生居中，汽车殿后，向学校进发。适天公不作美，下起了毛毛雨，学生鱼贯而行，个个精神振奋，

① 《上海大学启事》，《民国日报》，1922年10月23日。

秩序井然，于右任深受感动。到达学校后，尽管同学们衣服被雨淋湿，也都不愿休息而即刻召开欢迎新校长大会。

在欢迎大会上，教工代表陈藻青首先致词：“此次改造学校，可谓公理战胜强权。于校长为革命伟人，共和元勋，言论界之前驱，教育界之先进，敬为本校前途表示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于右任谦和答词：“予乃愿为小学生以研究教育，非好为人师。”“予实不敢担任校长，但诸君如此诚意，念西哲言互助之义，自动植物以致野蛮人类皆能互助，何况吾辈为有文化之人，自当尽力之所能，辅助诸君，力谋学校发展。”接着，邵力子以来宾身份发言：“于先生谦言愿为小学生以研究教育，余望诸君亦本此精神，切切实实地多求几年学问。”^①就这样，于右任担任了新创办的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后来在回顾上大创办时的情景说，我“思以兵救国，实志士仁人不得已而为之；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故立言“欲建设新民国，当先建设新教育”；“诩意莘莘学子，环而请业，拒之无方，而上海大学之名，遂涌现于中华民国之新教育界中”^②。不难看出，以发展教育振兴国家，尽力之所能建设学校，是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的基本出发点。

上海大学是国共合作办学的产物。当时，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因在军事和政治上屡遭挫折，遂倾心于文化教育事业，以图培植人才，积聚革命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急需培养干部，以开拓革命事业，也十分重视兴学育才。于右任则赞成国共合作，认为“社会党（指中国共产党）乃吾国新起为政治活动之党。吾闻其党多青年，有主张、能奋斗之士”，“不得不寄厚望于他们”^③。由于于右任的包容豁达和洞察时务，这就形成了国共两党人士真诚合作、共同办学的良好开局。

于右任执掌上海大学后，百端待举，步履维艰，遂决定与共产党联手，把上海大学办成东南地区最高学府、革命人才的摇篮。尽管他还需要经常为国民革命奔走忙碌，不能长期坐镇学校，但为上大的建设和发展、校务的运筹管理，仍然付出了不少心血，作出了他人难以替代的贡献。

① 《上海大学欢迎校长》，《民国日报》，1922年10月24日。

② 于右任《上海大学一览》弁言，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③ 于右任《国民党与社会党》，《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号，1924年1月。

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1922—1927） ①

一是延聘管理人才。于右任走马上任后，与邵力子约请李大钊、张继等在四马路（今上海市福州路）同兴楼京津菜馆磋商校务，请求予以支持和帮助。在李大钊的推荐下，由邓中夏任上大总务长，瞿秋白为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923年春，邓中夏到校视事，确定了办学方针，改革了学校建制，草拟了上海大学章程，并极力延聘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担任教职；瞿秋白到校后，提出上大的发展规划，期望上大能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身体力行，把社会学系发展成上大的支柱学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步入大学讲坛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上大成立初期，在这些颇有声望的管理人员的感召下，吸引并汇集了一批共产党早期的仁人志士，他们有的到上大直接任职，有的来宣讲革命的思想，由此，使得上大很快成为东南地区名副其实的革命的最高学府。

二是规划学科发展。于右任掌校后，多次召集全校教职员会议，详细讨论学科发展规划。他接手上大之初，学校仅设文学与美术两科，文学科分国文与英文两组，美术科分图音与图工两组，并设普通科（附中前身）。上大本本着适应社会之需要和学校之实际的精神，在于右任的主持下，拟定在大学部设社会科学院和文艺院；社会科学院下设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史学系、法律学系、哲学系、心理学教育系等；文艺院下设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俄国文学系、德国文学系、法国文学系、绘画系、音乐系、雕塑系等。为了使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庞大计划能切实落到实处，学校决定分三期逐步实施，每期两年。上大在日后几年里，社会学系、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都办得颇有生气。后因“四一二”政变学校被封闭，开始设想的总体规划，未能完全实现。

三是建立完善管理体制。上大创校之初，学校的重大事务通过教职员全体会议议决。但教职员会议人数太多，形式也不太正规。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急需建立健全的决策机制和领导机构。于是在1923年8月8日，于右任主持建立评议会（后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会议。评议会负责议定办学大政方针和处理全校一切重大事务。评议会不设议长，开会时由校长主持。除校长为主席评议员外，推选叶楚伦、陈德征、邓中夏、瞿秋白、洪野、陈望道、周颂西、冯子恭、邵力子等9人为评议员。8月12日，上大评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决组成校董会，拟请孙中山任名誉校董，蔡元培、汪精卫、李石

曾、章太炎、张溥泉、马宝山、张静江、马君武等 20 余人为校董,以提高学校声誉,争取办学经费,促进教育发展。

四是制定学校章程。1923 年 12 月评议会改成行政委员会。随着学校的发展,原有的暂行校则已不能适应实际的办学需要。在于右任的关照下,由总务长邓中夏等制定并颁布《上海大学章程》,于右任亲笔为章程题签。该章程明确规定:“本大学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在组织与行政方面,设校长 1 人,统辖全校事务;设校董会,规划学校经济,辅助学校建设;设行政委员会,决策学校大政方针。在学制方面,采用学分制,学生以每周上课 1 小时或实习 2 小时历 1 学期者为 1 学分,修满 140 学分并经考试合格者方能毕业。章程还对入学、缴费、转系、休学、考试、奖惩等作出规定,不久又拟定了行政委员会议事细则、校务处办事细则、学务处办事细则等各项具体文件,这就使得学校的建设有章可循,为日后的有序发展奠定了基础。

于右任与上海大学的这段不解之缘,与他 20 世纪初年到上海求学,耳濡目染上海的新式教育并从事办学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他在上大掌校的时间不长,但对学校则感情笃厚,对学生则充满关爱。从 1924 年起,因国民革命的需要,他辗转广州、北京、河南、上海等地,无暇过问上大具体校务,便请邵力子代理校长。

在沪时期,于右任先后参与创办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尤其是在执掌上海大学期间,吸引了诸多陕籍青年慕名来上大求学。在上海大学的开创期,陕西籍的各路英才纷纷加盟上大。曾任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杨基骏(陕西户县),1924 年春到上大担任中学部主任;曾任高雷道署财政科长的吴建寅(陕西泾阳),1922 年 11 月入上大任会计员;毕业于日本振武学校东洋大学的余寄文(陕西长安),1924 年春任上大图书管理员;曾任民治学校庶务长的李端峰(陕西三原),1924 年春来上大任会计处助理员。他们在于右任校长、邓中夏总务长的领导下,为上大的建设和发展同舟共济、尽心尽力。对求学沪上其他学校的陕籍青年学子,于右任依然尽力给予支持和帮助。据记载,仅陕籍学生在上海大学学过的知名人物就有邹均、马文彦、张仲实、冯润章、王超伯等 50 余人^①。这批学生大多在社会学系学习,后来有的被派赴苏

^① 党伯弧《大革命时期陕籍者在上海大学》,《西安文史资料》,1983 年第 4 辑。

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1922—1927) | ①

联留学,有的辗转各地开展革命活动。

作为一校之长的于右任,为筹措办学经费、维持学校正常运作煞费苦心。“上大自成立开始招生后,房租、图书、器具、印刷等费用,日多一日。而来求学的青年又多贫寒子弟,大多是免费欠费的。教职员有不少是尽义务或半义务。学校的经费是入不敷出的,一直由于、邵两校长维持着。”^①上海大学为扩建校舍,曾成立校舍建筑委员会,于右任和张继负责筹建。1923年4月上大召开教职员会议,讨论学校扩充和整顿等事宜,议决由于右任、张继负责筹备在宋公园(宋教仁墓地,今上海市闸北公园)建造新校舍事宜。虽然在宋公园建设新校舍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但于右任为上大的经费筹措一直没有停止过。把新建校舍选择在宋公园,是于右任出于对国民党先烈、战友宋教仁的深切缅怀。1923年7月1日,上大美术科图音、图工两班学生毕业,于右任率领学生到宋公园举行毕业典礼,并同学生合影留念。以后,上大的许多聚会活动,凡是于右任参加的,都选择在宋公园举行,意在教育后来者为共和民主奋斗不息。

作为政治活动家的于右任,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反袁斗争,他不赞成学生闭门读书,不问国家兴亡盛衰。他认为:“中国政治界之黑暗,亦可谓极矣。爱国之政治家,必须相互结合以自厚其势力,庶可以与此黑暗势力相搏斗。”^②为此,他积极支持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参加党派组织,集会结社,开展各种社会活动。1924年1月,上大学生社团孤星社成立,以“研究学术,讨论问题,彻底了解人生,根本改进社会”为宗旨。于右任欣然接受该社邀请担任名誉社长,表达了对学生社团活动的支持。于右任更以他的社会名望和豁达胸怀,邀请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如李大钊、汪精卫、胡汉民等)到上大为学生作政治或学术讲演,可见于右任执掌的上大对国民革命的关注,也体现了上大国共合作办学的良好局面。

为培养建国人才,于右任将上大纳入国民革命的轨道,认为“上大不比其他学校,希望上大同学,每人都能成为一强有力之炸弹,将来社会上定能发生极大之影响”^③。“炸弹”终于在1925年五卅运动时引爆。上海日商纱厂日籍工头枪杀工人顾正红惨案发生后,上大学生积极参加全市的“日人残杀同胞

① 程永言《“四一二”以后的上海大学》,《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

② 于右任《国民党与社会党》,《东方杂志》二十周年纪念号,1924年1月。

③ 《于校长关于本校之谈话》,《上大五卅特刊》第2期,1925年6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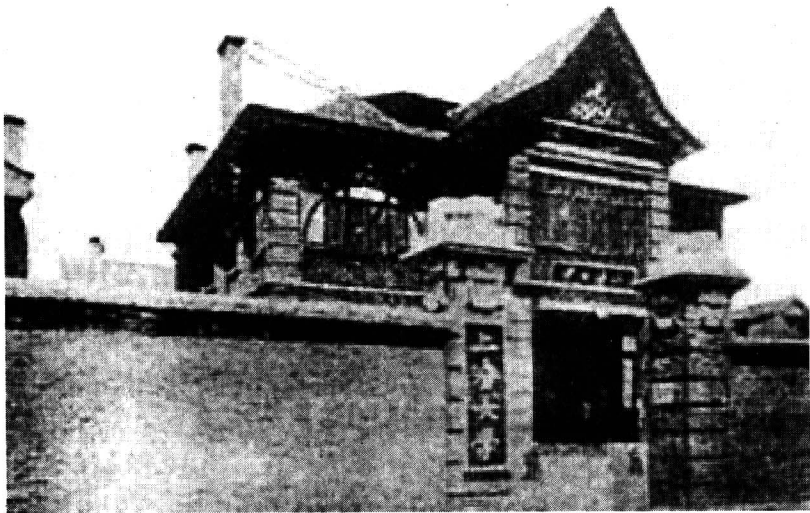
雪耻会”的声讨活动。5月30日,上大学生在南京路各处演讲示威,担当反帝爱国运动的先锋。广大学生的爱国义举引起了列强的恼怒,万国商团和英国巡捕于6月4日强行查封了上大(1924年春迁入租界西摩路)校舍。6月5日,于右任从河南开封赶抵上海,就五卅事件和上大校舍被占发表谈话,抗议列强蛮横暴行。他鼓励学生:“上大此次首先被封,正因上大反抗强暴之外人统治最勇猛,同学中切不可因学校被封而趋消极,盖吾校学生实最早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及不平等条约之口号,故受‘激’之诬。”^①6月6日,上大假小西门少年宣讲团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于右任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决定组织上大临时委员会,抗议列强暴行,安顿无处栖身学生,募捐建筑新校舍。于右任答应募捐2万银元,并赴各地募集资金汇沪,保障新校舍的建设。上大学生在五卅运动中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可歌可泣,时人评价:“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而后者尤为使民众运动深刻化,直接掀动从事生产的大众的反帝狂澜,成为民族运动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于世界于中国永远不可磨灭。”^②

1927年“四一二”政变,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作为国共合作产物的上海大学不久也遭国民党当局封闭,结束了其将近5年的历史。上大解体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一直不承认上大学生的学籍,致使曾在上大就学的近两千名学生在就业、晋级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于右任为争取上大学生的大学学籍资格,与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终于至1936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通过追认上大学生学籍、与国立大学享有同等待遇的决定。于是,各地上大同学纷纷成立同学会,力图进行复校活动。上大同学对于右任充满感激之情,更领悟到于校长希望大家继续发扬革命精神、肩负复兴民族之重任的真意,为弘扬上大优良传统,共赴国难、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

◎于右任(1879—1964),陕西泾阳人,生于三原。名伯循,以字行。光绪举人。1904年(光绪三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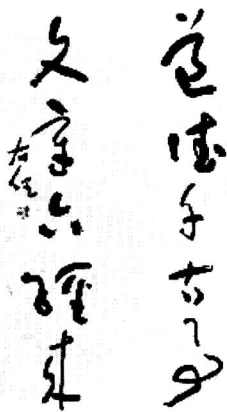


① 《于校长关于本校之谈话》,《上大五卅特刊》第2期,1925年6月23日。
② 张士韵《中国民族运动史上的上海大学》,《上海大学史料》,第3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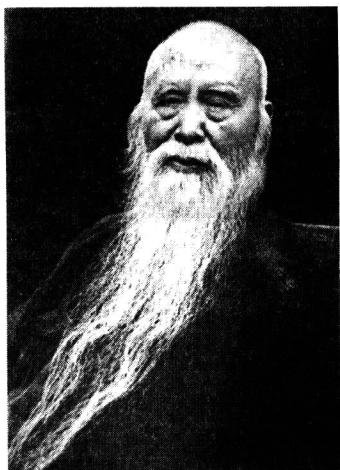


西摩路上海大学校址

震旦学院肄业。次年与马相伯及师友创办复旦公学、中国公学。1906年去日本,加入同盟会,被委为长江大都督。次年回国后,在上海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迭任社长、总编辑,鼓吹革命。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1918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10月与邵力子等创办上海大学,任校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被选为中央执行



于右任手书对联



晚年于右任

委员，倾向国共合作。1927年受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策应北伐。1928年起，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审计院院长、监察院院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职。1949年去台湾，1964年11月在台北病故。善草书，喜赋诗，晚年眷念大陆。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行世。

二、邓中夏主持上大校务

邓中夏(1894—1933)以北大青年学生的杰出代表身份，参与共产党北京发起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以开展平民教育、领导中国工人运动，成为终身的职业革命家。1923年春，邓中夏经李大钊介绍，应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之聘，到上大任总务长(即校务长)。他在上海大学主持校务工作将近两年，把一所很不起眼的“弄堂大学”，改造成为闻名遐迩的培养国民革命人才的红色学府。

1917年夏，邓中夏于湖南高师毕业后，慕北大之名考入国学门(系)学习。1920年邓中夏从国学门结业后，转入哲学门学习，1923年夏毕业。在北大的6年中，邓中夏广泛涉猎各种新知识、新文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同时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投身社会改革。1919年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邓中夏当选为总干事，组织团员实施社会教育，“促醒社会之自觉而引起同情”^①。他与同学一起参加五四爱国游行，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干事。1920年10月，邓中夏参加李大钊在北大召集的北京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是年冬，他到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邓中夏先后任北京分部主任、总部主任。1923年北京汉铁路大罢工后，邓中夏临近毕业，办完手续，随劳动组合书记部前往上海，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家生涯。邓中夏在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的同时，在李大钊的举荐下，协助于右任从事上海大学的校务管理工作。

1923年4月23日，《民国日报》刊载了一则醒目的消息：“本埠上海大学，

^① 朱务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缘起及组织大纲》，《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9月29日。